

晚清官書局與近代文獻傳承*

張宗友**

<目次>

- | | |
|-------------------------------|---------------------------------|
| I. 晚清官書局興起的時代背景 | IV. “平值售書”，以廣流傳：晚清官書局文獻傳播的途徑與策略 |
| II. 早期官書局的創辦與中興名臣恢復文教、傳承文獻的努力 | V. 晚清官書局在近代文獻傳承中的地位 |
| III. 晚清官書局的廣泛設立及其對傳統文獻的刊印 | |

近代中國，面對“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處於“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¹⁾，自強新政、救亡圖存先後成爲時代主題。政治領域內，由講求自強、實行新政、變法改良而至發動革命，最終推翻帝制；文化領域內，在譯介西學、啟蒙思想的同時，也著意于刊印傳統文獻²⁾，恢復與重振文教，客觀上保存了數千年傳承不墜的文化遺產。由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爲代表的中興名臣發起端，各地督撫等大員承其緒，晚清官書局應運而生，以其設立之廣、刊書之多、校勘之精、影響之大，成爲近代中國文化出版的主流。本文擬從文獻傳承的角度，探討晚清官書局的時代背景、創設歷程、刊書特

* 위 논문은 2012년도 동국대학교 논문장려 지원사업에 의해 이루어졌음.

** 東國大學校 中語中文學科 教授

- 1) 李鴻章，〈籌議海防折〉中語，載《李鴻章全集》卷二十四，時代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頁1063。
- 2) 本文根據論述需要，使用“傳統文獻”、“傳統典籍”等詞，指稱古代中國學術傳統內的按經史子集分類的文化典籍，無論其爲固有或出于清人新撰；而把來自西學的著述稱作“西學文獻”或“新學典籍”等。

點、傳播策略，及其在近代社會文化史中的作用與地位。

I. 晚清官書局興起的時代背景

中國文化悠久，清代又是傳統學術文化的整理與繁榮時期，傳世文獻極為宏富。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古老中國的大門為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所叩開，由此被動地邁入近代社會。經過歷次侵華戰爭，中國主權步步喪失，深陷列強瓜分的危局。“今則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制；又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³⁾“俄北瞰，英西睽，法南鄰，日東眈，處四強鄰之中而為中國，岌岌哉！沉磨牙涎舌，思分其餘者，尚十餘國。”⁴⁾

伴隨軍事侵略、貨物傾銷、政治欺凌而來的，是西方宗教、文化的漸次傳播並產生鉅大影響。辦報、譯書，利用出版物進行宣傳，是傳播信仰與輸出價值觀的有效手段⁵⁾。顯著的例子的是，洪秀全本來接受傳統文教，因科第失意而發起“拜上帝教”，建立天平天國，西方宗教的影響無疑是促其轉變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面對列強日益加劇的全方位侵略，有識之士群起探討富國強民、救亡圖

3) 李鴻章，〈籌議海防折〉，頁1063。該折作于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初二日，李氏分析的是日本興兵侵略臺灣之後的形勢。

4) 康有為，〈京師強學會序〉，載《康有為全集》第二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頁89。該文作于1895年9月，康氏分析的是甲午戰後中國面臨的危局。

5) 據統計，自1811至1842年，傳教士在馬六甲、新加坡、巴達維亞、廣州等地，共出版中文書籍與刊物147種；1843至1860年，香港與上海、寧波等六個割讓或通商口岸城市共出版各種西書434種，其中純宗教宣傳品即有329種，占75.8%。(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修訂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頁6-7。)

存之道，始由制器層面發其端，師夷長技以制夷；繼由制度層面推其波，提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開展自強運動；進而變法維新，改良政體。在思想文化領域，一方面向西方學習，借鑒成功經驗，其途徑是大量翻譯、刊印西學書籍；另一方面，則從悠久的文化傳統中尋找資源，重新釋讀傳世文獻，為新政、變法提供經典依據。前者本質上是西學中用，化西為中；後者本質上是推陳出新，古為今用。但是，要取法先賢，與古為新，來完成自強、圖存的使命，必須首先解決傳統文獻因兵燹之災而造成的大規模焚燬與缺失的問題。

縱觀近代史，直接給中國傳統文獻帶來嚴重損燬、文教秩序帶來鉅大破壞的，主要不是外侮，而是內亂，更確切地說，就是咸豐元年(1851)太平天國爆發後長達十四年、波及大半個中國的兵燹之災。

太平天國主要在兩個方面展示了顛覆傳統的力量。一是在政治上，建立了一個迥異於現行政治制度的“天國”政權，號稱遵奉“上帝”，人人平等；二是在文化上，焚棄了大量傳統文獻，搗毀了大批鄉校書院，後者正是傳統文教秩序的象徵。他們宣稱：“凡一切孔孟諸子百家妖書邪說者盡行焚除，皆不准買賣藏讀也，否則問罪也。”⁶⁾對太平天國燬滅傳統文化的威力，曾國藩在《討粵匪檄》中有如下揭示：“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紱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僞君僞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賈以取息，而謂貨皆天王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關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自古生有功德，沒則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雖亂臣賊子，窮凶極醜，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聖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粵匪焚郴州之學

6) 黃再興，〈詔書蓋璽頒行論〉，載《太平天國(一)》，中國史學會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頁313。

宮，燬宣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藉滿地。嗣是所過郡縣，先燬廟宇，即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皆汗其宮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斯又鬼神所共憤怒，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⁷⁾作為檄文，所言或有誇大，但其文辭背後，乃是沉痛之現實。事實上，對傳統文獻燬滅愈力，愈能證明燬滅者對傳統文獻功用體認得愈深。

廣西為太平天國策源地，兵燹之後，“人士流離，舊書悉燬，舊刊片板無存”⁸⁾。湖北“三次失陷，遭亂最深，士族藏書，散亡殆盡，各處書板全毀，坊肆無從購求”⁹⁾。安徽、江蘇、浙江等地，向為人文淵藪，文教最為發達，受戰亂之戕害也最重。藏有《四庫全書》的江南三閣，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圖書蕩然無存，杭州文瀾閣所存不足四分之一¹⁰⁾。“浙省自遭兵燹，從前尊經閣、文淵閣所存書籍，均多燬失。士大夫家藏舊本，連年轉徙，亦成烏有。……士子雖欲講求，無書可讀。”¹¹⁾南京為太平天國天京所在，同治三年攻破後，“兩岸房屋，十毀五六，存者亦止墻壁耳。文德橋面僅存一綫，文廟東偏尚有三四間壁立，餘則片瓦無完者。”¹²⁾同治六年(1867)，距太平天國失敗已有三年，江蘇學政鮑源深上奏說：“臣視學江蘇，按試所經，留心訪察，如江、蘇、松、常、鎮、揚諸府，向稱人文極盛之地，學校中舊藏書籍，蕩然無存，藩署舊有恭刊欽定經史諸書，版片亦均毀失。民間藏書之家，卷帙悉成灰燼。亂後雖偶有書肆所刻經書，俱係刪節之本，簡陋不堪。士子有志讀

- 7) 曾國藩，〈討粵匪檄〉，載《曾文正公全集》第十六《文集》，大達圖書供應社，1935年版。
- 8) 馬丕瑤奏文，載《光緒朝東華錄·光緒十五年十二月己亥》，朱壽朋編，張靜廬等校點，中華書局，1954年版，總頁2700。
- 9) 李鴻章，〈設局刊書折〉(同治八年(1869)五月二十日)，載《李鴻章全集》卷十五，頁684。
- 10) 據白君禮〈搶救瑰寶 嘉惠後學——記丁丙對圖書文化事業的貢獻〉一文，文瀾閣原存35990冊，太平軍入城後僅存8140冊。載《圖書與情報》2003年第1期，頁58。
- 11) 馬新貽，〈設局刊書疏〉，載《同治中興京外奏議約編》卷五，陳弼編，上海書店1984年影印清光緒刻本。
- 12) 張文虎，《張文虎日記·同治三年甲子十月初六日》，陳大康整理，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版，頁5。

書，無從購覓。蘇省如此，皖浙江右諸省，情形諒亦相同。以東南文明大省，士子竟無書可讀，其何以興學校而育人才？”¹³⁾學校、藩署、書肆、民間藏書之家，為各直省內傳世文獻最主要的保存之地，兵燹之下，幾無幸免。

世界文明古國中，惟中國僅存，數千年文化統緒，綿延不墜，積累了浩如煙海的文化典籍，形成了成熟的社會制度與文獻傳承體系。歷史上每次文獻浩劫，都能很快得以恢復，浴火重生。這一次，面對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有識之士再次挑起了恢復文獻傳承的重任。其中堅力量，就是在與太平軍作戰中崛起的以曾國藩為首的中興名臣們。

II. 早期官書局的創辦與中興名臣恢復文教、傳承文獻的努力

早期官書局的創辦，是以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為首的地方督撫的文化自覺行為。這與他們處在與太平軍作戰的第一綫，親眼目睹經籍蕩然的文化浩劫密切相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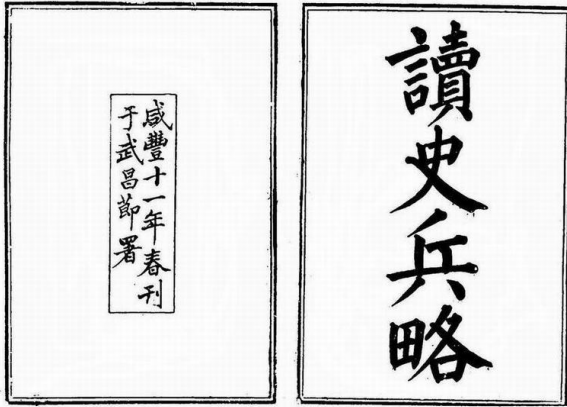
1. 修《兵略》以教將材：胡林翼與武昌書局的創辦

最早設局刊書的軍政要員，當推時任湖北巡撫、與太平軍作戰方殷的胡林翼¹⁴⁾。咸豐九年(1859)，他在武昌設局，首刊《讀史兵略》，目的在於“以教將材”¹⁵⁾，為現實需要服務：“天下之治，常肇於憂勤。而其亂也，皆由於逸樂。……轉移氣化之柄，則賴在上者有以防患於未萌。……因條取其言兵者彙編之，以朝夕循覽，期隔頑鈍……庶幾覽斯編者，憂世風之日下，而思整武以豫為之防，以無悖於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義云爾。”¹⁶⁾他在給友朋及僚屬

13) 鮑源深，〈請購刊經史疏〉，載《同治中興京外奏議約編》卷五。

14) 胡林翼(1812~1861)，字貺生、詠芝，長沙府益陽縣人。道光十六年(1837)進士，官至湖北巡撫，加太子太保。有《胡文忠公遺書》。

15) 嚴樹森編，《胡文忠公(林翼)年譜》，載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八輯，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頁291。



(書影一 胡林翼《讀史兵略》，武昌書局刻本，1861年)

的信中，也反復申明此意。如與左宗棠書云：“天下絕少智略之人，近月發憤著書，取《左傳》《通鑑》之兵事地理而編次之。兵書以智略為上，地理以釋今為考證。公講輿地二十年，管兵事又十年，明晰此中之精微者

矣。”又與糧臺諸君書：“梅村所著極佳，此編成，必敬授諸君子各一部，精而熟之，可為帝者師矣。”¹⁷⁾ “以帝者師”相期，可見胡氏對此書極為自負。

《讀史兵略》的刊刻，“始於九年二月朔日，藏事於十年十二月十二日。編輯者，及門江寧汪孝廉士鐸；分輯者，漢陽孝廉胡君兆春、武昌孝廉張君裕釗、獨山孝廉莫君友芝、長沙明經丁君取忠、長沙布衣張君華理也。”¹⁸⁾ 胡林翼雖忙于軍務，仍親與其事：“當時開局於武昌，節次按寄黃州，故公與文若書，有‘披閱節鈔’語也。”¹⁹⁾

武昌書局所刊書，除《讀史兵略》外，還有《一統輿圖》、《練勇芻言》²⁰⁾，前者為地理之書，後者為兵學著作，都與軍事有關；又有《弟子箴

16) 胡林翼，〈讀史兵略序〉，載是書卷首，《續修四庫全書》本(影印清咸豐十一年(1862)春武昌刻本)，冊967，頁645。

17) 梅英杰編，《清胡文忠公林翼年譜》卷三，載王雲五，《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第四輯，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頁220~222。梅村指汪士鐸。

18) 胡林翼，〈讀史兵略序〉，頁645~646。按：付刻的《讀史兵略》採錄資料至五代時止，而胡序中說：“其宋、元、明三史亦皆告成，將俟續刊之。”可知其原來構擬之規模尚不止此。

19) 梅英杰編，《清胡文忠公林翼年譜》卷三，頁220~222。

20) 參鄧文鋒，《晚清官書局述論稿》所考。中國書籍出版社，2011年版，頁73。

言》之刻²¹⁾，屬於勸導弟子向學的書籍。諸書或重軍事，或重品行，可知其刊書注重的是教化與現實需要。胡氏歿後，武昌書局還刊刻了胡氏遺集²²⁾。

2. 刊《六經》作育士民：左宗棠在寧波、杭州等地的設局刊書活動

另一位較早設局刊書的軍政要員為左宗棠。曾入左幕的陳其元說：“今各直省多設書局矣，而事則肇于左爵相，局則肇於寧波。爵相創軍府于嚴州，嚴當兵燹之後，田疇荒蕪，草木暢茂，遺民無所得失。爵帥於賑濟之外，發銀萬兩購買茶筍，俾百姓得採擷于深山窮穀以為資，茶筍製成，紮發寧波變價，往返二次，歸正款外，得羨金數千兩。爵相以亂後書籍板片多無存者，飭以此羨餘刊刻四書五經。嗣杭城收復，復於省中設局辦理，即以寧波之工匠從事焉。蘇州、金陵、江西、湖北相繼而起，經史賴以不墜，皆爵相之首創也。”²³⁾左宗棠自稱：“不佞少貧嗜學，苦無錢買書，於家塾中得見桂林陳文恭公在湖南刊行《四書》大字本及《五種遺規》，又于親戚書塾中得見儀封張清恪公正誼堂匯刻儒先各種書殘缺本，輒欣然忘食。厥後撫浙，見歙鮑氏所刻《六經》，較文公大字本為精，遂取刻之。由寧波招致手民，期年告成，今所行之影刻本也。……當兵戈滿目、學校頽敝之日，斯文斷續之交，顧可坐令墜緒弗理乎？”²⁴⁾又云：“照得陝、甘回變以來，古籍銷之，誦習久廢，《五經》、《四子書》坊間素無善本，近並坊本亦購覓維艱。屢據漢、回士民稟求頒發書籍，雖經隨時由西安購取散給，既屬無多，且坊本訛舛相

21) 方宗誠，《柏堂師友言行記》卷三：“東南文字，盡毀于賊，胡文忠在湖北，首開書局，刻《讀史兵略》、《弟子箴言》。”《續修四庫全書》本，冊540，頁568。

22) 張文虎同治四年(1865)五月十八日記：“節相送《益陽胡文忠遺集》來，凡奏牘一卷、守黔書牘二卷、撫鄂書牘四三卷、撫鄂批牘三卷，其首卷則國史本傳及年譜也，朝邑閣中丞敬銘所編，刊于武昌書局。文忠忠勇沈毅，幹濟多方，為節相所推服，讀此集可見其概已。”《張文虎日記》，陳大康整理，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版，頁39。

23) 陳其元，《庸閒齋筆記》卷三，中華書局，1989年版，頁59~60。

24) 左宗棠，〈翁藩司同爵呈齋各種書籍由〉，載《左宗棠全集》第十六冊，上海書店1986年據光緒刊本影印版，頁13979~13980。

因，無從校正。因念本爵大臣同治三年戡定浙江時，曾捐廉覓匠，影刊鮑刻《六經》，最爲精好，亟應翻刻此本，散佈各府廳州縣書院鄉塾，俾邊隅士子於古籍銷亡之後，復得善本，以資誦習，庶經正民興，異時有望也。”²⁵⁾

同治二年(1863)四月，左宗棠任閩浙總督兼浙江巡撫，五月即收復寧波，次年一月、二月先後克復嚴州、杭州。其局“肇於寧波”，蓋在同治二年，以刊印四書五經爲務；次年遷杭州，刊鮑刻《六經》，刻工仍係從寧波招募者。鮑刻《六經》向稱善本，左氏對此書最爲樂道，數年後主政西北，還想再度翻刻，以期“經正民興”。對此書的重視，足證左氏對刊刻經典、恢復文教秩序重要性的認同與力行。

3. 砥礪名節，重振土風：曾國藩兄弟與安慶、金陵書局的創立

縱覽近代中國文化史，在設局刊書、傳承文獻方面影響最大的，首推被視爲中興名臣之首的曾國藩。不少學者將創辦官書局的事業首歸于他。劉聲木說：“同治年間，曾文正公國藩踵前代南監本、北監本之例，創立官書局。一時如江南、江蘇、淮南、浙江、江西、湖北、湖南七處，均設立官書局，刻印四部中要籍，流傳甚廣。”²⁶⁾ 淨雨也說：“紅羊之後，各省官書局先後創立，至今猶多在焉。況周儀[頤]《蕙風簃二筆》：‘咸豐十一年八月，曾文正克服江南，部署稍定，命莫子偲大令採訪遺書。既復江寧，開官書局于冶成山，此江南官書局之俶落也。’”²⁷⁾《清史稿·藝文志》甚至過爲誇大，認爲金陵、蘇州、揚州、浙江、武昌等五家官書局都是曾國藩倡導設立的。

同治二年(1863)，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與其弟曾國荃，欲刊清初大儒王夫之的遺書，設局于安慶軍械所內，資金則由曾國荃捐獻，“軍書旁午之

25) 左宗棠，〈劄陝鄂糧臺翻刻《六經》〉，載《左宗棠全集》第十六冊，頁14493~14494。

26) 劉聲木，《菴楚齋續筆》卷三，載其《菴楚齋隨筆續筆三筆四筆五筆》，中華書局，1998年版，頁283~284。

27) 淨雨，〈清代印刷史小記〉，載《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二編》卷三，張靜廬輯，上海群聯出版社，1954年版，頁342。

時，文人學者，輻輳安慶，從事校刊²⁸⁾。曾國荃旋率軍圍攻天京，刊書事務由曾國藩主持。書局延請名士歐陽兆熊“董其事”，分任校讎的則有張文虎、劉毓崧等十六人，都是一時俊彥。次年(1864)六月，曾國荃攻破天京，曾國藩移節署于江寧，書局也隨之東遷。據張文虎日記，書局主要人員(包括刻工)于九月十五日乘舟出發，二十一日抵寧後，書局暫封在銅作坊偽慕王府內²⁹⁾。曾國藩《王船山遺書序》(以下簡稱“曾《序》”)中揭示，全書“同治四年十月刻竣，凡三百二十二卷”，前後費時兩年而成，所謂“庀局於安慶，歲事於金陵³⁰⁾”。曾氏親與其役，“國藩校閱者，《禮記章句》四十九卷，《張子正蒙注》九卷，《讀通鑑論》三十卷，《宋論》十五卷，《四書易詩春秋諸經稗疏考異》十四卷，訂正訛脫百七十餘事”(曾《序》)。

曾國藩、國荃兄弟設立書局，首刻《王船山遺書》，其用意有三。一是刻全遺書，表彰鄉賢。王夫之為清初大家，承宋儒之學，“注《正蒙》數萬言，注《禮記》數十萬言，幽以究民物之同，顯以綱維萬事，弭世亂於未形，其於古昔明體達用、盈科後進之旨，往往近之”(曾《序》)。湖湘學風，向崇程朱，對王夫之的學問，極為推服。王夫之著述達一百餘種、四百多卷，身後刊刻的只有二十多種，收入《四庫全書》的也只有九種。道光十五年，其裔孫王世全謀刻一百五十卷，“新化鄧顯鶴湘皋實主其事，湘潭歐陽兆熊曉晴贊成之。咸豐四年，寇犯湘潭，板毀於火”(曾《序》)。曾國藩兄弟以湘軍起家，刻鄉賢遺書，自能籠絡湘人。二是弘揚節義，砥礪士氣。明清易代，王夫之終身不出，迥出群流之上。曾國藩甚至將他同以氣節著稱的顧炎武、李塨作對比：“聖清大定，訪求隱逸，鴻博之士，次第登進。雖顧亭林、李二曲輩之艱貞，徵聘不絕於廬。獨先生深閤固藏，邈焉無與。平生痛詆黨人標榜之習，不欲身隱而文著，來反唇之訕笑，用是其身長遯，其名寂寂，

28) 柳詒徵，〈國學書局本末〉，載《柳詒徵史學論文續集》，柳曾符、柳定生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頁443。

29) 《張文虎日記》，頁1、3。

30)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第十六《文集》，大達圖書供應社，1935年版，頁15~16。據李志茗考證，《船山遺書》始刻于同治二年冬。參其《從倡節義到興文教》一文，載《社會科學》2010年第10期，頁140。

其學亦竟不顯於世。”(曾《序》)在太平軍橫掃區夏、人心動蕩之際，以王夫之學問、人品相標榜，自有砥礪名節、重振綱常之用心。三是藉以養士，引領士風。曾國藩自組練湘軍以來，幕中聚集了大批能士，大者能統兵作戰，經營國是，著者如李鴻章；小者亦能辦理公務，刊校書籍，著者如張文虎。總之，藉王夫之遺書之刊刻，曾國藩兄弟實欲崇尚節義，收拾人心，恢復倫常，重振文教。

書局從安慶遷至江寧之初，曾國藩、國荃兄弟既已謀刻經史諸書。張文虎同治三年(1864)九月二十九日記：“同曉岑、壬叔往見沅帥。沅帥願重刻《十三經》、段注《說文》、《史記》、《漢書》、胡刻《通鑑》、《文選》諸書，舉以見屬。出至九兒巷，訪芋仙不值，回局。沅帥來拜，商刻書事，並辭行。”³¹⁾所涉諸書，堪稱經部、史部、集部的代表作。十月十三日，“節相論刻書章程，謂十三經古注，惟《易》《書》《孝經》不足刻，固然。然相沿已久，不能廢，且無他古注完本可補者，不能定也。”³²⁾可見，曾氏兄弟已與書局中人商略章程，討論圖書之版本事宜；也說明戰火方熄，曾氏兄弟即致力于刊刻經史，恢復文教。刊書之議，因曾國荃還鄉養病、曾國藩事務繁雜，一度進展緩慢。這一時期內，《張文虎日記》中不乏校《毛詩》傳箋、《左傳》《公羊傳》的記載，可知書局實已着手準備。

4. 刊印經史，恢復文教：李鴻章與金陵書局的刊書活動

同治四年(1865)五月，曾國藩奉命北上剿捻³³⁾，李鴻章繼任兩江總督。李氏原為曾國藩幕賓，到任後也以刊印傳世文獻、恢復封建文教為職志，對書局業務既有承繼，也有開新。首先，他接續原有刊書活動，並擴大選題範

31) 《張文虎日記》，頁3。曉岑指歐陽兆熊，壬叔指李善蘭，芋仙指李士棻，沅帥即曾國荃。

32) 《張文虎日記》，頁6。節相指曾國藩。

33) 《曾文正公年譜》：“(同治四年五月初九日)是日奉上諭：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曾國藩，現赴山東一帶督師勦賊。”《曾文正公全集》第二十六，頁146。據《張文虎日記》，曾氏離開江寧的時間為五月二十五日。

圍。《船山遺書》即完工于李氏任上。張文虎六月十八日記：“時李宮保欲重刻五經、四書以爲童子讀本，故分校之。”³⁴⁾可見童蒙教育讀本，已入李氏視野。其次，闕定章程，籌措經費。由張文虎所記，可知當時謀畫，頗爲周詳：“周縵老自李宮保處來，言所擬章程皆如議，準七月初開局。此費出自鹽務餘款，每年約可六千金，每月五百金。若用寫手六人，發刀十五人，挑清四十人，一日出字六千，一月出字十八萬，計刻資二百八十八千，校勘薪水支銷外，贏餘以爲紙料、印工之資，其書發坊貨賣，所入亦添作經費，永爲常例。”深知刻書匪易的張文虎由衷贊嘆道：“此舉有益人文不少也。”³⁵⁾再次，延請周學濬等入局，但仍保留張文虎等精幹力量，從事校刊。“傅相肅毅伯李公繼督兩江，議開書局刻經史各書，烏程周縵雲侍御學濬總其事，仍延先生校理。因商定條例，以呈李公，公亟稱善。”³⁶⁾

李鴻章在任期間，書局刻書不少。張文虎在給曾國藩的書信中，通報了刻書情況：“自七月以來，合肥李宮保憫亂後書籍殘燬，坊刻經書多誤文俗字，童蒙之始，在所宜慎，因即舊局，鳩工開雕善本。文虎繆承縵雲侍御引佐校讎之役，先校刊《朱子本義》、《呂氏音訓》、《詩集傳》、《四書集注》，均已竣事。《伊川易傳》初授梓，《尚書蔡傳》須俟之明春。其《三禮》《三傳》擬用古注，次第刊行，而繼之以《史記》《兩漢書》《資治通鑑》《文選》。”³⁷⁾已刊之書，全爲朱子著作，《易傳》《蔡傳》均程朱之學，與清廷尊奉程朱理學的既定文化政策高度一致；對史籍、《文選》的刊刻意圖，與曾氏全同，正可證李效曾後，同以傳承文獻、恢復文教爲己任³⁸⁾。

34) 《張文虎日記》，頁52。“周縵老”即周學濬，字縵雲，浙江烏程人。

35) 《張文虎日記·六月廿四日》，頁54。

36) 閔萃祥，〈張先生行狀〉，轉引自〈國學書局本末〉，載《柳詒徵史學論文續集》，頁445。張先生即張文虎。見柳詒徵〈國學書局本末〉，頁444。

37) 此外，據徐蘇〈江蘇官書局考辨〉稱，李鴻章于同治四年還設有江蘇書局，至同治六年，已刊有《小學集注》等書。載《圖書館雜誌》1990年第5期，頁61。

38) 此外，據徐蘇〈江蘇官書局考辨〉稱，李鴻章于同治四年還設有江蘇書局，至同治六年，已刊有《小學集注》等書。載《圖書館雜誌》1990年第5期，頁61。

5. 表彰程朱，商量舊學：左宗棠與正誼堂書局的刊書活動

同治四年(1865)十二月，左宗棠平定福建，立即着手從經濟、文化等方面恢復既有秩序。次年三月，“迺於會城開蠶棉館，諭州縣增積貯備荒，又以閩中理學之邦，思有以延其緒，設正誼堂書局”³⁹⁾。設立這個書局的直接目的，就是刊刻《正誼堂全書》。該叢書為清初著名循吏、理學家張伯行撫閩時所彙刻，收有程朱學派著述達五十五種，“掃異學之氛霧，入宋儒之堂奧”⁴⁰⁾，表彰宋學，閩學由是大興。左宗棠對張伯行非常推崇，早年從事舉業時，就讀過《正誼堂全書》的一部分，此次重刊，就成為他安撫士紳、商量舊學、恢復文教的重要舉措。“茲來清恪舊治，亟詢是書，僅存四十四種，而龍峰書院所藏版片則蝨蛀無存矣。爰擇省會文昌宮設正誼堂書局，飭司道籌款，就所存本先付手民開雕，餘俟訪尋續刻。書成，散之各府縣書院，俾吾閩人士得以日對儒先，商量舊學，以求清恪、文勤遺緒。”⁴¹⁾其用意十分明顯。為刊書順利，他還注意招徠人才：“近年科舉頻開，得舉者多，諒不乏有志問學之士。其願入局任分校之役者，各赴署報名，本月十六日取齊，定期十八日面試榜示。取入者月致膏火銀五兩。本爵部堂判事之暇，亦將來局與同志之士共相討論，儻不以時過，不學而棄之乎？”⁴²⁾

書局設立的當年，即刊刻了《全書》六十三種，超過了原有規模；後于同治八年至九年，又以正誼堂書院的名義，續刻了包括張伯行所輯《唐宋八大家文鈔》在內的五種書。正誼堂書局的設立及《全書》的續刻，體現了左宗棠表彰程朱理學、紹復先儒正統的努力。

39) 羅正均，〈清左文襄公宗棠年譜〉卷四，〈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第二十輯，臺北：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頁250。

40) 左宗棠，〈創設正誼堂書局告示〉，載《左宗棠全集》第十六冊，頁14583。

41) 左宗棠，〈創設正誼堂書局告示〉，頁14583~14584。文勤指蔡世遠(1681~1734)，字聞之，號梁村，漳浦縣人，人稱梁山先生。

42) 左宗棠，〈創設正誼堂書局告示〉，頁14584。

6. 傳承文獻，引領風氣：早期官書局的特點及其奠基作用

如將上述早期官書局的設立及刊書情況作為一個整體加以考察，那麼，下列共性是顯而易見的：

其一，書局的發起人或支持者，都是直接領兵與太平軍(捻軍為其餘波)苦戰的軍政要員，胡林翼、左宗棠、曾國藩兄弟、李鴻章等，莫不如此。作為傳統士人的傑出代表，他們以顯赫的戰功，成為中興名臣，挽狂瀾于既倒，振文教于將衰。尤其是曾國藩，一直主持或遙領金陵書局事務，以其設局刊書時間之早、持續之長、質量之精，著稱于世，足為名臣中重建文教的代表人物。

其二，設局刊書，是曾國藩等中興名臣的自覺行為。其原因當是在與太平軍作戰的過程中，親眼目睹了兵燹之災給傳統典籍、文教秩序帶來的巨大破壞作用。作為傳統文教體制下培育出來的精英人物，對此自然不能袖手旁觀。

其三，早期設局刊書的目的，在於砥礪氣節、端正人心、培育人才，恢復、重建既有的文教傳統。

其四、刻書內容，以軍事實務、童蒙讀物、傳統經史為主，程朱理學一系的著述，受到空前重視。一方面由於程朱理學本來是清廷認可的正統之學，科舉以四書五經為範圍；另一方面也由於程朱理學強調正心誠意，敦敘人倫，教化有序，切合時用。

其五、書局業務方面，經費出於自籌，人員主要延請幕僚充當。養士、刻書並舉，既能保證質量，又能籠絡士人，引領學術風氣。

以上幾點，實際上奠定了此後官書局刻書的基本理念與原則。設局刻書雖以恢復、重建文教為目的，客觀上擔負起了近代文獻傳承的歷史使命。時人讚嘆說：“烏乎！粵寇之興，天下雲擾，曾、胡諸公，左提右挈，卒夷大難，雖當時將帥攀附，多汗馬之勞，然所至郡縣，即興學校、講文藝、崇儒重道，不數年間東南元氣逐漸以復，此其綱維國本者，豈不偉邪！”⁴³⁾結合當時情勢，可知這段評論是比較中肯的。

III. 晚清官書局的廣泛設立及其對傳統文獻的刊印

以曾國藩爲首的中興名臣早期自發的設局刊書活動，影響逐漸遍于全國，引起了其他地方主政官員的同調共鳴。同治後期至光緒初期，地方要員紛紛上疏陳情，官書局在各省廣泛設立。其中，江蘇學政鮑源深的上疏，最具代表性。

1. 鮑源深《請購刊經史疏》與官書局的廣泛設立

同治六年(1867)，時任江蘇學政的鮑源深，上奏《請購刊經史疏》，要求廣開書局，刊印經史。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疏文，既回顧了本朝的文教傳統，又指出了當前嚴峻的需求形勢，進而提出合理的措施與建議。這一時期有關設局刊書的奏疏很多，但理據與措施大都未能超出此篇，堪稱代表之作。該疏對了解當時文獻傳承的現狀及朝野共識極爲有益，因此照錄、分析如下：

疏文首先概括了本朝收藏、頒發、刊印御纂、欽定諸書的傳統：“臣伏查學政全書，各省府州縣學，向有尊藏御纂、欽定諸書，並於雍正乾隆初年，迭經奏准，令直省撫藩將頒發御纂、欽定經史諸書，敬謹重刊，並聽坊間印售，以廣流傳；又議准督撫將十三經、廿一史諸書購買，頒發各學收管，令士子講習等因在案，仰見列聖右文稽古，嘉惠士林至意。”次陳近年兵燹之後，“以東南文明大省，士子竟無書可讀”之窘境(參前引)，實無以“興學校而育人才”。再請旨購補，擇要刊刻：“臣擬請旨，將殿板諸書，照舊重頒各學。誠恐內存書籍無多，武英殿書板久未整修，亦難刷印。因思由內頒發，不如由外購求。敬請敕下各督撫，轉飭所屬府州縣學，將舊存學中書籍，設法購補，俾士子咸資講習，並籌措經費，擇書之尤要者，循例重加刊刻，以廣流傳。”復論當前經史書籍之缺乏及刊印之必要：“現在江寧省城，已設局

43) 見方宗誠，《柏堂師友言行記》卷首序文(題“蓬萊慕玄父”撰)，頁541。

刊刻四書五經，惟所刊皆係學中讀本，於經史大部書尚未遑及。竊維士子讀書，以窮經爲本，經義以欽定爲宗。臣伏讀世祖章皇帝御註《孝經》、聖祖仁皇帝御纂《周易折中》、欽定《書》《詩》《春秋》三經《傳說彙纂》，世宗憲皇帝御纂《孝經集註》、高宗純皇帝御纂《周易述義》《詩義折中》《春秋直解》、欽定《三禮義疏》，皆闡發精微，權衡至當，足使窮經之士，不淆於衆說，得所指歸。以上各書，請旨敕下各撫藩，先行敬謹重刊，頒發各學，並遵舊例，聽書估印售，以廣流傳，庶使僻壤窮鄉，皆知研求經學。至窮經之外，讀史爲先。全史卷帙浩煩，現在經費未充，重刊匪易。恭請敕令，先將聖祖仁皇帝御批《通鑒綱目》，高宗純皇帝御批《通鑒輯覽》，敬謹先刊，分發各學，士子讀之，已可貫串古今，賅通全史。其餘各書，再行陸續刊刻。”末申經費之易籌及刊書爲中興之盛舉：“或疑現在各省經費支絀，籌餉艱難，似購書刊書，無暇遽及。夫勘亂則整武爲先，興學則修文宜亟，況購書刊書經費，每年不過籌餉中百之二三，籌捐尚易，誠令學校經史重完，士子深於經者，窺聖學之原，深於史者，達政事之要，體用兼賅，益卜人才蔚起，於以光列聖右文之治，廣皇上教育之仁，豈非黼黻中興之盛舉哉！臣愚昧之見，謹繕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⁴⁴⁾

鮑氏此疏，將稽古右文的治統與恢復文教的現實需要緊密結合，情理兼備，足以動人。“士子讀書，以窮經爲本，經義以欽定爲宗”，“至窮經之外，讀史爲先”，這些觀點，應該說代表了當時朝野士大夫的共識。奏疏很快得到批復，從而使各地的設局刊書活動，由早期督撫的自覺行爲，上昇爲統治集團的集體意志，具備了“奉旨刊書”的合法性依據。各地隨後紛紛設立官書局，連偏遠省份也積極響應，蔚成風氣。

44) 鮑源深，〈請購刊經史疏〉，載《同治中興京外奏議約編》卷五。李鴻章，〈設局刊書折〉(同治八年五月二十日)：“奏爲遵旨設避[局]刊書，隨時頒布以資實學而廣人材，恭折奏請，祈聖鑒事。竊查接管卷內準禮部咨議，覆御史范熙溥奏：‘軍務肅清省分，亟應振興文教，請將所屬書院妥爲整頓，奉旨依議，欽此。’續又準咨，同治六年五月初二日奉上諭：‘鮑源深奏請刊刻書籍，頒發各學一折等因，欽此。’恭錄行知，均經前署督臣李瀚章、前撫臣曾國荃會商辦理。”(頁684。)可知鮑氏此疏當上于五月之前。

對近代中國究竟設立了多少家官書局的問題，學界尚無定論。最早的統計僅有14家⁴⁵⁾，後來增至26家⁴⁶⁾，最新研究認為有四十餘家⁴⁷⁾。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在於對官書局的界定標準存在差異⁴⁸⁾。應當看到，官書局主要為重建、振興封建文教而設，任務是刊印、傳播傳統典籍，實際上為近代中國的自我變革，提供了傳統思想文化資源賴以存在的文獻基礎。因此，刊印傳統典籍是判定官書局的必要條件。這樣看來，那些雖以官書局為名，而以販售書局刻書或翻譯西書為務、並不刊印傳統典籍的機構，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官書局。按照這一理路，結合學界研究成果⁴⁹⁾，可知以下三十家當無疑議：

-
- 45) 淨雨，〈清代印刷史小記〉，載《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二編》卷三，頁342~343。
 46) 參梅憲華，〈晚清的官書局〉，載《出版史料》1989年第3、4合期，頁67~68。
 47) 參鄧文鋒，〈晚清官書局述論稿〉，頁80~103。
 48) 王曉霞，〈晚清官書局研究綜述〉中指出，對官書局的範圍，當前學界存在着三種不同的觀點。載《大慶師範學院學報》2011年第2期，頁114。
 49) 除前引各種論著外，還參考了以下論文：孔毅，〈崇文書局刻書始末〉，載《春秋》1987年第2期；顧承甫，〈清末官書局二三事〉，載《出版史料》1989年第3、4合期；徐學林〈曲江官書局是清末最早的官書局之一〉，載《出版史料》1989年第3、4合期；張其中，〈四川官書局考略〉，載《四川圖書館學報》1989年第5期；汪家燊，〈清末地方官書局〉(上、下)，載《圖書館雜誌》1990年第1、2期；葉農，〈廣雅書局始末及刻書考〉，載《出版史料》1990年第2期；孔毅，〈清代官書局刻書述略〉，載《文獻》1992年第1期；胡昭熔，〈湖南書局、傳忠書局、思賢書局考辨〉，載《出版史料》1992年第2期；方振益，〈湖北官書局(崇文書局)考略〉，載《出版史料》1993年第1期；汪家燊，〈“直隸官書局”和湖南官書局〉，載《出版史料》1993年第1期；劉泳唐，〈嚴修創辦貴州官書局〉，載《貴州文史叢刊》1993年第5期；陳相因，〈廣西官書局始末〉，載《廣西地方志》1994年第1期；陳邦翔，〈浙江書局刻書考〉，載《書目季刊》2002年第4期；張雪琴，〈從浚文書局到山西書局〉，載《新聞出版交流》，2003年第5期；張磊，〈張之洞與廣雅書局〉，載《圖書情報工作》，2004年第5期；吳家駒，〈局本二十四史述略〉，載《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7年第5期；王連浩，〈雲南官書局考略〉，載《蘭臺世界》2011年第2期；胡學彥〈清末杭州的浙江官書局〉，載《出版史料》2011年第2期；李志茗，〈金陵書局考辨——以晚清同光時期為中心〉，載《史林》2011年第6期。

序次	書局	地點	創設時間	創設人	備 注
1	武昌書局	武昌	咸豐九年 (1859)	胡林翼	刻《讀史兵略》、《練勇芻言》等
2	寧波/ 杭州書局	寧波 杭州	同治二年 (1863)	左宗棠	刻鮑刻《六經》
3	安慶/ 金陵書局/ 江南書局	安慶 南京	同治二年 (1863)	曾國藩 曾國荃 李鴻章	刻《王船山全書》《史記》 《文選》等。同治三年(1864) 遷金陵, 光緒初易名江南書 局
4	江蘇書局	蘇州	同治四年 (1865)	李鴻章	刻《小學集注》《讀禮通 考》《牧令書輯要》《江蘇 全省輿圖》等
5	正誼堂書局	福州	同治五年 (1866)	左宗棠	刻《正誼堂全書》
6	浙江官書局	杭州	同治六年 (1867)	馬新貽	刻《御纂七經》《新唐書》 《二十二子》《王文成公全 書》等
7	崇文書局/ 湖北書局	武昌	同治六年 (1867)	李瀚章 曾國荃	刻《說文解字》《明史》 《胡文忠公遺集》等三百餘種
8	聚珍書局	南京	同治六年 (1867)	李鴻章	排印硃批諭旨
9	廣東書局/ 粵東書局	廣州	同治六年 (1867)	蔣益澧 方濬頤	又稱羊城書局。刻《通志堂 經解》《欽定四庫全書總 目》《牧令書》等
10	曲水書局/ 曲江書局	安慶 常州	同治七年 (1868)	吳坤修	刻《孝經章句》《汪子遺 書》、《乾坤正氣集》、《半 畝園叢書》等
11	福建書局/ 福州書局	福州	同治七年 (1868)	鄧廷枏	刻《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等
12	成都書局	成都	同治七年 (1868)	吳棠	刻《御纂七經》、前四史、 《朱子全書》《八家文》等
13	淮南書局/ 揚州書局	揚州	同治八年 (1869)	方濬頤	刻《全唐文》《鹽法志》等

14	陝西官書局/ 西安書局	西安	同治十年 (1871)	左宗棠	又稱秦中書局。翻刻鮑氏 《六經》等
15	江西書局	南昌	同治十一年 (1872)	劉坤一	刻《御纂周易折中》、《阮 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江西通志》、《農桑輯 要》等
16	傳忠書局	長沙	同治十二年 (1873)		前身爲忠義錄書局。曹耀湘 主持。刻《曾文正公全集》， 另有單刻本25部。光緒十七 年併入思賢書局
17	雲南官書局	昆明	同治十二年 (1873)		由原雲南書局改稱。刻《御 纂七經》《御批歷代通鑑輯 覽》《理學宗傳》《古文淵 鑑》等
18	湖南書局/ 省城書局/ 湘南書局	長沙	同治十三年 (1874)		前身爲長沙府學尊經閣，同 治三年(1864)後一度改稱尊 經書局。刻有叢書兩套50 部，單刻本68部，如《古文 辭通義》等
19	山東官書局	濟南	同治九年 (1870)	丁寶楨	刻《十三經注疏》《歷代通 鑒纂要》《玉函山房輯佚 書》等
20	濬文書局/ 山西官書局	太原	光緒五年 (1879)	曾國荃 閻敬銘	刻有《十三經讀本》《史記 譯林》《牧令全書》《近思 錄集注》《古文辭類纂》等
21	尊經書局	成都	光緒五年 (1879)	吳棠 張之洞	附設尊經書院內。刻有《春 秋經傳解詁》《蜀典》等
22	迪化書局	迪化	光緒五年 (1879)	左宗棠	刊《六經》及《千字文》等 童蒙讀物
23	直隸官書局	保定 北京	光緒七年 (1881)		孫家鼐主持。刻有《左傳杜 林》《畿輔通志》《保定府 志》等
24	南菁書局	江陰	光緒十一年 (1885)	王先謙	專刻《皇清經解續編》

25	廣雅書局/ 廣州/ 廣東書局	廣州	光緒十二年 (1886)	張之洞	刻《周易解詁》《少室山房集》《離騷彙訂四帙》等書，尤以刻《史記索隱》等史籍著稱
26	桂垣書局/ 桂林書局	桂林	光緒十五年 (1889)	馬丕瑤	“刊六經讀本，續刊有關實學諸書”(馬氏奏文中稱)
27	思賢書局	長沙	光緒十七年 (1891)	郭嵩燾 王先謙	由思賢講舍刻書處與傳忠書局併成。刻書86部及《玉函山房輯佚書》一套
28	味經官書局	涇陽	光緒十七年 (1891)	柯逢時	刻《十三經》《廿四史》《通鑑》《通考》《通典》《通志》等
29	貴州資善堂書局	貴陽	光緒二十年 (1894)	嚴修	翻印其他書局刻書，如《書目答問》等
30	存古書局	成都	宣統元年 (1909)	趙爾巽 趙啟霖	主辦人爲羅元黼。調尊經、錦江書院版片刻書。刻有《尚書馬鄭注》《資治通鑑》《朱子全書》《八代詩選》等

就各地官書局設立情況來看，有以下幾個特點：

其一，官書局地域分布不平衡。東部省份較多，東南諸省尤爲突出。東南爲文教重心所在，受內亂兵燹之災最重，又是最早感知西方軍事、經濟、文化的巨大沖擊的地區。

其二，官書局大規模設立，是在同治后期至光緒中期，確切地說，是在甲午戰爭以前。此一時期，清廷仍是國家中樞及士人向心力所在，有識之士仍以富國強兵爲目標，高倡“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仍然從傳統文化中尋找自強、新政、改良的思想資源。

其三，地方督撫等要員仍是設立官書局的中堅力量。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仍繼續主持局務，或開設新局，張之洞、丁日昌、馬新貽等繼起設局，遙相呼應。這與地方督撫實權在握、足以引領士風有關。應當看到，自

近代以降，清廷對地方督撫的控制力實際上漸趨減弱，中央刻書已漸無足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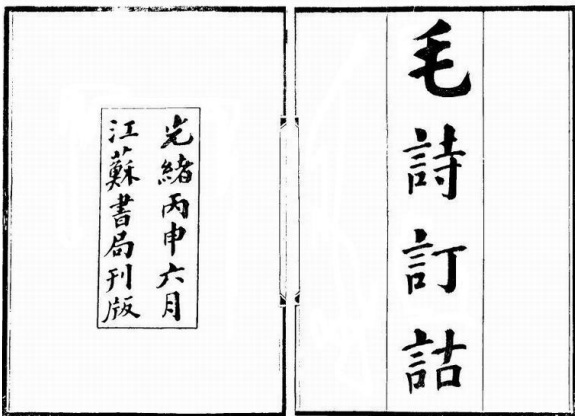
晚清官書局設置地點不一，時間不一，存續不一，業務範圍也各有側重，但如果把晚清官書局作為一個總體加以審視，那麼，歷代各種形式的傳統文獻(包括啟蒙讀物、學術著作)，都成為晚清官書局的刊刻對象，無論是內容，還是質量，晚清官書局都堪稱是刊印傳統典籍的主要機構，是近代史上傳承本邦文獻的最大功臣。

2. 晚清官書局以刊印傳統文獻為主

晚清官書局所刊書籍，遍及四部，經部、史部尤為大宗。

六經是先秦時代王官之學的文教遺存，是封建制帝國政教資源的集中體現，隨着儒家地位在西漢的獨尊，六經及其解說被確立為六藝之首，成為最重要的文獻資源。歷代圍繞六經而產生的傳、說、記、注、箋、疏、正義、集解之作層累式地發展，至中古時期蔚成經部，成為古代中國最重要的文獻類別。晚清官書局以恢復文教、傳承文獻為己任，經部書籍理所當然地倍受重視。同治四年(1865)，曾國藩在設局刊書之初，就着手刊印朱子《周易本

義》十二卷，次年發雕朱子《詩經集傳》八卷《詩序辨說》一卷、程頤《易經程傳》八卷、蔡沈《尚書蔡傳》六卷、陳澧《禮記集說》十卷、姚培謙《春秋左傳杜注補輯》三十卷，朱子《四書集注》十九卷則刊行于同治十一年



(書影二 顧棟高《毛詩訂詁》，江蘇書局刻本，1896年)

(1872)⁵⁰，用以課舉取士的四書五經全在刊刻之列，可見主事者試圖恢復原有文教傳統的努力。此後大部分官書局都以刊刻經部典籍作為首要任務，《十三經注疏》《通志堂經解》《古經解匯函》等經解叢書廣為刊刻流布。清代漢學鼎盛，官書局也刊印了不少本朝人的經學著作。光緒十一年(1885)，時任江蘇學政的王先謙設南菁書局于江陰，專門刊刻他編輯的《皇清經解續編》，以紹承阮元《皇清經解》之緒，使清人經解著作蔚成系列。

振興文教，童蒙為先，因此各地書局都重視童蒙讀物的刊刻與傳播。左宗棠的看法十分具有代表性：“經正民興，人才從此出，風俗亦從此厚矣。覽諸生所陳義學條規，鮮有見及者。須知自灑掃應對至希聖希天，下學上達，皆是一貫。今日入塾童子，先宜講求《幼儀》、《弟子職》，而歸重于《小學》一書，方為得之。”⁵¹

史部文獻一向是晚清官書局的刊刻重點，不少書局就以刊印史籍而著稱于世。如金陵書局、淮南書局、廣雅書局等。茲以廣雅書局為例。該局由時任兩廣總督的張之洞奏設于光緒十三年(1887)，資金充裕，刊印了大量傳統典籍，尤以史部為盛。1917年，廣東圖書館擇其版片尚佳、版式一致者刊為《廣雅叢書》，凡經類26種、小學類11種、雜類(大部分屬子部書)17種、史學類93種、集部7種。該叢書第一種為清人丁晏的《周易解詁》一卷，書前載有叢書目錄，每種均注明版本。茲擇其中與《史記》《漢書》有關的著述為例：

序次	書名	著者	版本
1	《史記索隱》三十卷	(唐)司馬貞	汲古閣本
2	《史記志疑》三十六卷	梁玉繩	清白士集本
3	《史記三書正訛》三卷	王元啟	祇平居士集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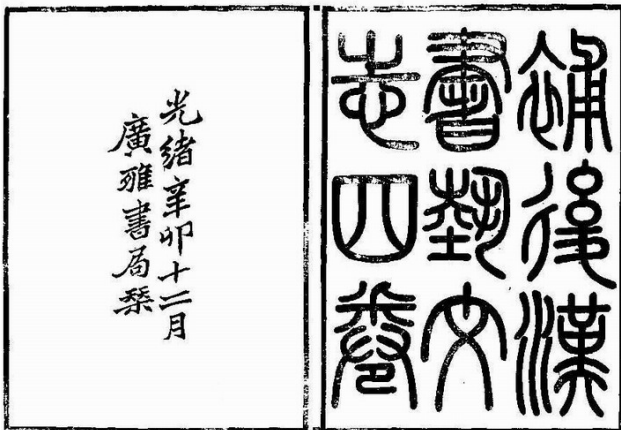
50) 參蘇曉君，〈從國圖館藏看金陵書局所刻書〉中之統計，載《中國典籍與文化》2010年第1期，頁83~91。

51) 左宗棠，〈平涼縣王令啟春稟設義學條規由〉，載《左宗棠全集》第十六冊，頁13966。

4	《史記月表正訛》一卷	王元啟	傳抄本
5	《史記功比說》一卷	張錫瑜	傳抄本
6	《史記注補正》一卷	方苞	望溪集本
7	《史記毛本正誤》一卷	丁晏	家刻本
8	《史漢駢枝》一卷	成孺	傳抄本
9	《史記天官書補目》一卷	孫星衍	昭代叢書本
10	《史記楚漢諸侯疆域志》三卷	劉文淇	淮南書局本
11	《漢書辨疑》二十二卷	錢大昕	銅熨斗齋本
12	《漢書注校補》五十六卷	周壽昌	家刻本
13	《漢志水道疏證》四卷	洪頤煊	心架齋本
14	《漢志西域傳補注》二卷	徐松	陽湖張琦刻本
15	《漢書人表考》九卷	梁玉繩	清白士集本
16	《漢書人表考校補》一卷	蔡雲	家刻本
17	《前後漢書注考證》二卷	何若瑤	何宮贊遺書本

清代為中國古代學術的大整理時期，史學非常發達，班馬異同，尤為清代學人所喜論。上表中與《史記》《漢書》相關的著作即有十六種，遠較他

史為勝。廣雅書局刊印史籍，特別重視以下兩點：甲、以清人史著為主(叢書中只有《史記索隱》為唐司馬貞所著，其他92種全為清人著作)，不少著作是第一次刊印；乙、底本選擇面廣，既有



(書影三 侯康《補後漢書藝文志》，廣雅書局刻本，1891年)

已刊本，也有未刊本；既有家刻本，也有坊刻本。劉文淇《史記楚漢諸侯置域志》一種，還選擇了淮南書局的刻本作為底本，足見該書局刻本之精，也見出廣雅書局的擇善而從。

晚清官書局在刊刻史部典籍方面，還有一件藝林盛事，就是五局合刻《二十四史》。“五局”指金陵書局、浙江書局、湖北崇文書局、江蘇書局與淮南書局；《二十四史》即由《史記》至《明史》的二十四部正史，它與《十三經注疏》一起，構成傳統經史典籍的兩大主幹。浙江巡撫李瀚章、江蘇巡撫丁日昌、湖廣總督馬新貽、湖廣總督李鴻章，以及直隸總督任上的曾國藩，對五局合刻一事極為珍視，聲氣相通，共襄盛舉，開創了中國出版史上合刻典籍之先河⁵²⁾。柳詒徵指出：“惟局雖分設，事多協商，故江南先刊四史，湖北踵刻史書，因有分任全史之舉。當時督撫和衷共濟，又多學者參預其間，待其顛末，不獨為書林佳話，亦可見治體之休明。”⁵³⁾合刻本以校勘精審名世，為後世全面點校、整理正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牧令書是專講為官之道、如何處理政務的一類史籍。清代自嘉道以降，已無康、雍、乾三朝勵精圖治之氣象，八旗魚爛，吏治廢弛，地方官吏面對世變之局，常常茫然失措。曾國藩就任直隸總督後，就在給友人的信中抱怨“直隸吏治極壞”⁵⁴⁾，而直隸向稱首善之區。因此，地方督撫在設局刊書、振起文教之時，講求“治道”的牧令之書，也成為重視的對象。同治七年(1868)，江蘇巡撫丁日昌上疏清廷，愷切痛陳：“竊惟國家設官分職，皆以為民，而與民是親，莫如州縣。得其人則治，失其人則亂，自古為然，於今尤急。溯自軍興以來，州縣中歧途雜出，流品亦至不齊，雖其中固多可造之才，而平日於吏治諸書，曾未體會，一旦身膺民社，茫然無所持循。凡百工技藝，皆學而後能，豈有親民有司，不學而能無謬失者！此循良所以日鮮而民困所由日

52) 具體分工是：浙江書局刻《舊唐書》、《新唐書》、《宋史》，江蘇書局刻《遼史》、《金史》、《元史》，崇文書局刻《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和《明史》，淮南書局刻《隋史》，金陵書局刻餘下十四史。

53) 柳詒徵，〈國學書局本末〉，頁449。

54) 王媛整理，〈曾國藩、李鴻章、洪汝奎等致張文虎函札〉，載《文獻》2009年第2期，頁145。

深矣。……故今日欲敦吏治，必先選牧令；欲選牧令，必先使耳濡目染於經濟致治之書，然後胸中確有把握，臨政不致無所適從。”⁵⁵⁾ 江蘇書局特別重視牧令書的刊刻，如同治八年(1869)春刊竣的《牧令書輯要》一書，係丁氏親自選評，節錄了顧炎武、于成龍以降六十餘位名儒、循吏之言行、治績，分治原、政略、持家、用人、事上、接下、取善、屏惡、農桑、賦役、籌荒、保息、教化、刑名、戡暴、備武、事彙、憲綱等十八門，薈萃一書，略等于“為官指南”，堪稱牧令書的代表。該局另外刻有《牧令五種》、《牧令需知》、《秋獻集要》、《籌濟編》、《圖民錄》、《實政錄》、《捕蝗要訣》、《蠶桑簡明輯說》等。其他書局也重視牧令書的刊刻，如金陵書局刻有《蠶桑輯要》，崇文書局刻有《荆楚疏修》、《蠶桑輯要》、《荒政輯要》、《救荒補遺》等。

諸子學是古代中國重要的思想源泉，但漢武帝世儒家取得獨尊地位之後，其他各家之學即漸趨衰微，從歷代傳世目錄中諸子著作日漸減少的事實，即可發現這一趨勢。清代學者對傳統文獻進行了大規模整理，諸子學方開始有所復蘇。近代以降，面對外侮日亟、內亂頻仍的困局，變法圖強為有識之士所倡導，逞說強辨、務窮其智的諸子學，於是重新成為最重要的思想資源之一。在這種背景下，子學著作也進入官書局的刊刻視野，如金陵書局刻有王念孫《讀書雜誌》十種七十六卷，思賢書局刻有《荀子集解》《莊子集釋》及《玉函山房輯佚書》等。崇文書局刻《百子全書》(又名《子書百家》)，較為有名。但最具代表性的，當數浙江書局刊刻《二十二子》。該局由被目為“乾嘉考據學之殿軍”的俞樾擔任總辦，精選底本進行校讎，“注重吸收歷代學者，尤其是清代諸家整理和研究諸子學的成果，彙編了歷代刊本中較有代表性的精校、精注本。有些子書還附錄有關參考資料。選目精當，刻

55) 丁日昌，〈蘇省設局刊書疏〉，載陳弢編，《同治中興京外奏議約編》卷五。清廷對此，樂見其成：“同治七年三月初十日內閣奉上諭：丁日昌奏設局刊刻牧令各書一摺。州縣為親民之官，地方之安危繫之。丁日昌現擬編刊牧令各書，頒發所屬，即著實力舉行，俾各州縣得所效法。”載蘇州書局所刊《牧令書輯要》卷首，徐棟原編，丁日昌選評，《續修四庫全書》本，冊755，頁3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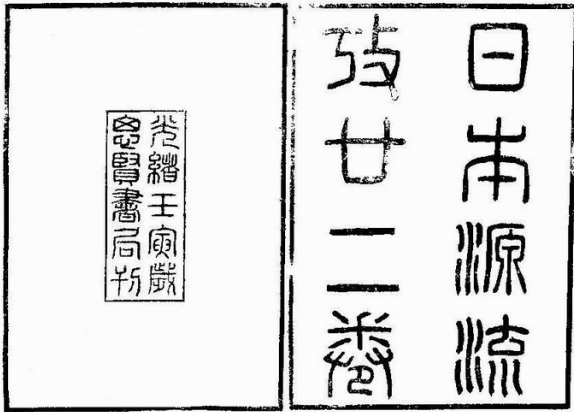
印尤善，在這一時期所出版的諸子書彙刻本中，堪稱上乘之作。”⁵⁶⁾百年之後，該書仍被翻印，足見其價值。其他類型的子書，也屢加刊刻，如浙江局即刻有大型類書《玉海》等。

集部典籍也在官書局刊刻範圍之內，本朝著述尤其受到重視。曾國藩等在創建書局之初，即謀刻《文選》，至同治八年(1869)刻成李善注本六十卷；此前已于同治五年開雕了兩部詩選，即姚鼐《惜抱軒今體詩選》十卷與王士禛《漁洋山人古詩選》三十二卷，開創官書局刊刻集部典籍之先河。姚氏為桐城派古文的代表人物，王士禛執清初詩壇之牛耳，他們選編的著述得以刊刻，不難看出主持大局的曾國藩之志趣所在。不少書局刻有名家別集注本及總集，如浙江書局有《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廣雅書局有《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思賢書局有《駢文類編》等。

前揭鮑源深奏疏，把刊印御纂、欽定之書放在首要地位。“世祖章皇帝御制《孝經集注》，高宗純皇帝御纂《周易述義》、《詩義折中》、《春秋直解》、欽定《三禮義疏》皆闡發精微，權衡得當，足使窮經之士，不淆於從說，得所指歸”，請“旨敕各撫藩先行敬謹重刊，頒發各學，並遵舊例，聽書估印售，以廣流傳。”同治帝即諭敕各省督撫實行，又准浙江書局重刊《欽定七經》、《御批通鑒》、《御選古文淵鑒》等書。今存宣統元年刻本《江西書局價目》中，不僅可見上述諸書，還可見《欽定詩經傳說匯纂》、《欽定春秋傳說匯纂》、《欽定書經傳說匯纂》、《御纂資治通鑒綱目三編》、《御纂朱子全書》、《御纂醫宗金鑒》、《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御制勸善要言》等書。從內容上看，這類書以傳統經籍為主，雖然在官書局所出圖書中所占比例很小，但卻是各局“敬謹先刊”的對象，反映了效法聖主、護持正統的取向。

近代以降，國門被迫洞開，國人欲求富國強民，奮起直追，先是追求“師夷長技以制夷”，繼而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學習西方制器之長。在睜眼看世界的過程中，不能不對西方的軍事、史政、吏治、教育、外交、科技

56) <出版說明>，見《二十二子》書前，上海古籍出版社縮印浙江書局彙刻本，1986年版，頁1。



(書影四 王先謙《日本源流考》，思賢書局刻本，1902年)

《日本軍事教育編》、《西政叢書》、《日本師範》、《交涉要覽》、《時務大成》、《政治學》、《倫理學教科書》、《電學》、《化學導源》等，都有官書局刻本。不過，刊印傳統典籍、傳承文獻的任務，主要由官書局承擔，而翻譯西書、引進西學，則主要由江南製造局翻譯館等譯書機構承擔，構成了近代文化出版的兩大分野。

3. “但求校讎之精審，不問成書之遲速”：“局本”的煉成

晚清官書局的刻書以精選底本、校讎精審聞名于世，號稱“局本”⁵⁷。“諸局之書，皆校刊審慎，人呼為書局板，著於目曰‘局本’，以地名冠之。”⁵⁸

雖然各家書局在刊刻質量上頗有參差，不能一概而論，但總體說來，局本的確以質取勝，聲名遠播。前揭廣雅書局刊刻的史學叢書，浙江書局刊刻的《二十二子》，都以底本選擇審慎、校勘精審而著稱于世。如廣雅書局所

57) 據孔毅研究，官書局的底本大致有殿本、古籍善本、清人稿本和稀見刊本等，選擇比較審慎。參其〈清代官書局刻書述略〉一文，載《文獻》1992年第1期，頁231~245。

58) 淨雨，〈清代印刷史小記〉，載《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二編》卷三，頁343。

等方面，作全方位的
了解。于是有關西學
的書籍，也成為官書
局刊刻對象。金陵書
局即刊有《幾何原
本》。其他如《臨陣
心法》、《萬國史
略》、《日本歷史》、
《日本史綱》、《蒙
古史》、《外國列女
傳》、《英國員警》、

刻書，其底本有寫本(稿本、清稿本、鈔本)和刻本兩個系列，後者又有家刻本、自刻本、原刻本、叢書本、局本、殿本等分別，選擇範圍涵蓋了大部分版本類別⁵⁹)。對寫本的刊刻，尤見官書局保存、流布傳統文獻的作用。

金陵書局成立較早，由于延請著名校勘學家從事其役，質量尤足稱道。柳詒徵云：“刊本之最著者，《四書》、諸經、《史記》、《前漢書》、《三國志》、《文選》、王氏《讀書雜誌》、漁洋山人《古詩選》，出於張文虎之手；《穀梁》、《毛詩》、《後漢書》、出於戴望之手，皆極矜慎，而《史記集解索隱正義》一書，文虎用力尤勤。”“當時京朝大官，索局刻者紛起，蓋以其校刊之精，突過殿本也。”⁶⁰)

金陵書局所刻《史記》，堪稱局本的代表，尤其在校勘是書過程中所確立的校勘理念，極為精要，成為官書局共同遵遁的指導原則。能形成這樣的局面，張文虎等人的精心校勘，曾國藩的大力支持，缺一不可。

金陵書局很早就着手《史記》的校勘工作。同治八年(1869)三月，還在直隸總督任上的曾國藩致信張文虎、唐仁壽說：“《史記》十表尚未刊就，又有四、五卷須重刻者，自難迅速竣工。鄙意但求讎校之精審，不問成書之遲速。校勘記若在十卷以外，便恐傷繁，能再求簡約，一洗漢學家好多好詳之習，乃為盡善，過多則閱者反厭苦矣。”⁶¹)“但求讎校之精審，不問成書之遲速”，可謂擲地有聲，體現了曾氏之胸襟與眼光，也為其他官書局刻書講求質量樹立了高標。是年八月，曾國藩再次致信張、唐，信中說：“《史記》舊少善本，此次會合諸家，斟酌體例，當可度越諸本。即成功稍遲，自不必以局外之譏評介意也。”⁶²)

據統計，張文虎等校勘《史記》，參校本達十七種之多⁶³)，的確是“會合諸家”，所以能“度越諸本”。上世紀五十年代，國家組織力量點校正史，《史

59) 參葉農，〈廣雅書局始末及刻書考〉，載《出版史料》1990年第2期，頁110~115。

60) 柳詒徵，〈國學書局本末〉，頁447、448。

61) 王媛整理，〈曾國藩、李鴻章、洪汝奎等致張文虎函札〉，頁145。

62) 王媛整理，〈曾國藩、李鴻章、洪汝奎等致張文虎函札〉，頁147。

63) 鄧文鋒，〈晚清官書局述論稿〉，頁213。

記》的底本就採用了金陵書局的本子。在以中華書局編輯部的名義寫成的《點校後記》中，開篇就說：“《史記》版本甚多，史文及注文往往各本大有出入。我們不用比較古的如黃善夫本，也不用比較通行的如武英殿本，而用清朝同治年間金陵書局刊行的《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合刻本》（簡稱金陵局本）作為底本，分段標點，因為這是一個比較完善的本子。”⁶⁴⁾

如果說刊印內容廣泛，以經史為主，遍及四部，滿足了“量”的要求，那麼，精選底本、精心校勘，就滿足了“質”的要求。在中國學術、文化史上，晚清官書局正以此奠定了近代文獻傳承的品質基礎。

IV. “平值售書”，以廣流傳：晚清官書局文獻傳播的途徑與策略

晚清官書局最重要的屬性是“官”辦，根本任務在於恢復並重建既有的文教秩序，為實施新政、變法維新等自改革運動提供傳統思想資源的支持。在地方督撫及其幕僚的主持下，官書局資金較為固定和充裕，這就決定了在圖書刊印、文獻傳播、圖書發行等方面，確立了不以贏利為目的的原則，通過官方、市場兩大途徑，使圖書得以快速流布、傳播。這是其迥異於其他刻書主體（尤其是坊刻）的顯著特點。

1. 文獻傳播的官方途徑

官書局的官辦性質，使其在文獻傳播方面具有官方的發行渠道，概括起來，無非上行、平行、下行三種方式。

(1) 上行方式：主要是進呈，即上呈皇帝或上繳中央機構。光緒二十年（1894），翰林院侍讀王懿榮上奏：“曲阜衍聖公府自近歲不戒於火，舊藏書籍圖籙焚燬一空，現在各直省設立書局，以官錢刻書者，三十年來，珍籍善本，燦然大備。除以初印精槧一分解送翰林院，敬備皇上取進御覽，一分解

64) <點校後記>，載《史記》點校本附錄，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0冊，頁1。

交國子監，充備肄業諸生傳習外，可否懇恩飭下各直省督撫有書局者，無論新舊諸刻本，亦以一分解交山東巡撫轉行曲阜，作為恩賜，衍聖公孔令貽敬謹儲藏，以為誦法之資。遇有新刻，陸續咨解。”⁶⁵⁾可知各書局新刻解送翰林院、國子監為定例。光緒二十七年(1901)，禮部、政務處會奏變通科舉章程：“閩中備考書籍，均係欽頒，間有調閱，隨時坊間購置。禮部向存書庫，卷帙紛繁，兵燹之間，全行散失，現又改試策論，講求中國政治史書，及各國政治藝學，所需書籍尤多。查同治年間，江南、浙江、湖北、廣東省，曾將各種書籍，設局刊版，流傳已久；所有場中備用各書，擬由禮部開單，咨取江南、浙江、湖北、廣東各省官書局，照單咨送。”⁶⁶⁾二十九年(1903)，光緒帝諭令江寧、江蘇、江西、浙江、湖北、廣東、四川等省督撫，將官書局刊刻書籍擇要刷印，進呈御覽。湖廣總督端方，一次就上呈湖北書局所刻一百一十六種書⁶⁷⁾。

(2) 平行方式：主要是咨調，在各地官府機構與各官書局之間進行。例如，“同治十年(1871)■月，立江南鹽巡道。孫公衣言以江寧士子寒畯者多難於得書，請於總督曾文正公，取江寧、江蘇、浙江、湖北四書局新刊經籍，每部四分，藏於惜陰書院，凡本籍士子，得詣書院借讀，事領於官而簿錄出納則紳士掌之。”⁶⁸⁾前揭王懿榮奏請將各直省書局刻書解送一分到山東曲阜，也屬咨調。光緒十五年(1889)，馬丕瑤上奏，請將江南、浙江、廣東、湖南、

65) 王懿榮，〈重疏前請整理孔子祀田并清查地產疏〉(光緒二十年十一月初四日)，載《王文敏公遺集》卷三，《續修四庫全書》本，冊1565，頁160。

66) 〈會奏變通科舉章程〉，載《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二編》卷一，頁65。

67) 端方〈進呈書籍摺〉頗具代表性，茲錄其奏文如次：“奏為遵旨進呈書籍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於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日承准外務部簡電內開軍機大臣面奉諭旨：‘所有江寧、江蘇、江西、浙江、湖北、廣東、四川各省官書局刊刻書籍，著各該督撫擇要刷印進呈，欽此。’欽遵電寄前來。伏查湖北官書局設自同治初年，歷年刊刻，類多經史有用之書，當即札飭該局，將所刻書籍擇要刷印兩分，茲已裝訂成帙，計書一百一十六部，共二百零七函，委員齎解，赴京交納，恭呈御覽。”末附有清單。載《端忠敏公奏稿》卷三，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十輯，文海出版社，頁330~331。

68) 汪士鐸等纂，《(同治)續纂江寧府志》卷六〈實政〉“勸學官書局”條，《中國地方志集成》本(江蘇府縣志輯第二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頁53。

湖北、四川等局所刊經史各本，“每種刷寄十部”，分發各府廳州書院，“妥議章程，俾士子獲資借閱”。“得旨，如所請行”⁶⁹⁾。兩年後，“兩江督臣咨送書三十二種”，江蘇六十五種，湖北一百七十三種，湖南十六種，浙江二十種，廣東六十七種，江西一十八種，“哀集群籍，蔚爲大觀”，“凡藝林承學之士所當家絃戶誦者，固已燦然美備，即名物象數，專門著述，亦頗並蓄兼收”⁷⁰⁾。光緒二十二年，李端棻奏請推廣學堂，建設新政，“今請依乾隆故事，更加增廣，自京師及十八行省省會，咸設大書樓，調殿版及各官書局所刻書籍，暨同文館、製造局所譯西書，按部分送各省以實之”，“古今中外有用之書，官書局有刻本者，居十之七八。每局酌提部數，分送各省，其費至省，其事至順，一奉明詔，事即立辦。而餉遺學者，增益人才，其益蓋非淺鮮也。”⁷¹⁾

(3) 下行方式：主要是頒送，即廣泛地頒送本地書院、學校。李鴻章《設局刊書折》：“俟各書刻成之日，頒發各學書院，並准窮鄉寒儒、書肆、賈人隨時印刷，以廣流傳。”⁷²⁾可見，爲了擴大傳播範圍，官書局還允許私人刷印刻成之書。前揭鮑源深《請購刊經史疏》中，已要求“請旨敕下各撫藩，先行敬謹重刊，頒發各學，並遵舊例，聽書估印售，以廣流傳，庶使僻壤窮鄉，皆知研求經學”。

2. 文獻傳播的非官方途徑

官書局雖以振興文教爲己任，不以贏利爲目的，但校讎、刊印書籍，畢竟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費時經年，奏功匪易，如果没有雄厚的財力作後盾，勢難持久。上述官方渠道的流通，雖能快速傳播，擴大影響，但從經營的角度來看，大都是無償送出或折價售出，勢難保本。因此，通過向社

69) 馬丕瑤奏文，載《光緒朝東華錄·光緒十五年十二月己亥》，總頁2700~2701。

70) 馬丕瑤奏文，載《光緒朝東華錄·光緒十七年二月壬戌》，總頁2855。

71) 李端棻，〈奏請推廣學校設立譯局報館摺〉，載《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二編》卷一，頁6。

72) 載《李鴻章全集》卷十五，頁685。

會發售，以回收部分成本，維持正常運轉，就成了各書局的必然選擇。不過，與書坊旨在射利不同，官書局設立的宗旨，決定了在售書時定價較有節制，遵循的是“平值售書”的原則。

曾國藩等人開創的金陵書局設置較早，“平值售書”的原則也由該局最先確立。汪士鐸主纂的《續纂江寧府志》對此記載較詳：“同治三年(1864)四月，總督曾文正公與弟今山西巡撫威毅伯刊《王船山遺書》，立局安慶。江寧收復，移局東下，初設於鐵作坊，後移江寧府學之飛霞閣，延請紳士一人督理局事，提調道府一人佐之，並延四方績學之士分任校勘，稽工匠之勤惰，遴長者授以事。書成，平其值售之。”⁷³⁾這一做法，同樣為其他書局所採用，成為通行的原則。如淮南書局：“同治四年，署鹽運使李宗義開養賢館，以收恤寒賤。八年，鹽運使方濬頤議設書局，整理舊存鹽法志及各種官書殘版，刊布江淮間耆舊著述，即延館中士人至局校理，其經費仍于裁減成本項下開支。書成，平其值售之。”⁷⁴⁾

“平值售書”是一種理念，只是一種理想狀態，實際操作中難免會有所偏離。有的書局一旦發現估價過高，則立即予以糾正。江蘇書局的售書目錄中就有一個生動的例子⁷⁵⁾。

73) 汪士鐸等纂，《(同治)續纂江寧府志》卷六〈實政〉“書局”條，《中國地方志集成》本，頁52~53。按：該志刊竣於光緒七年(1881)。汪士鐸曾入胡林翼幕修《讀書兵略》。

74) 謝延慶等修，《(光緒)江都縣續志》卷十六〈學校考第六〉“書局”條，《中國地方志集成》本(江蘇府縣志輯第六十七種)，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頁227。

75) 《江蘇書局各書價目》載：“頭品頂戴江南蘇州等處承宣佈政使司布政使鄧，為曉諭事：案據內閣中書炳孫等呈請核減書價以惠藝林等情，當經行局議稟在案。茲據該局提調稟稱，向章凡書刻成，均按每部需用紙張數目估計工本，酌加板息二成擬價。查板息系抵支局用工費之項，茲奉飭議減，惟有將板息減去一成。請自三月起，凡局售各書，悉照前價九折。稟請查奪，前來本司查核。所議照舊價九折，與江寧、浙江書局刊行書價比較，均屬有減無增。除批飭准行外合行曉諭，為此示，仰士商人等知照。嗣後書籍出售，悉照此次所刊折實、新訂價目為憑。毋違特示(《古逸叢書》一種仍照原碼不扣)。光緒十九年三月初一日示。”該目內頁又名《江蘇書局重訂核實價目》，江蘇書局編，光緒十九年(1893)刊本。該目經部有書36種，史部61種，子部28種，集部36種，另有寄售書目13種。

官書局圖書銷售的方式，有書局自售和書肆代售等。

(1) 書局自售。各書局都有出售自己刻書的，有些書局即設有專門售書的官書坊。少數無力刊刻書籍的官書局，則專以運售其他官書局刻書為務。例如，山東書局堪稱是各省官書局的分銷處，經銷本局書有經部28種、史部94種、子部3種、集部8種⁷⁶⁾。光緒七年(1881)，直隸總督李鴻章在天津設立官書局，“飭備成本，購運各省新刊書籍，設局照本發售，俾北方寒士，增廣學識”⁷⁷⁾。山西官書局因經費不足而自身暫停刻書，專門購銷其他書局刻書。

(2) 書肆代售。官書局所刻書刊刻精細，品質較好，又“平其值以售之”，因此銷路很好，書商均願經銷。孫殿起在北京經營通學齋書店，販賣古籍數十年，就經銷過官書局的圖書。在他的《販書偶記》中，就記錄了官書局所刻清人著述116種(該書著錄嚴格，版本重複者不錄)。其他機構也有代售的。光緒二十一年(1895)，上海強學會欲“開大書藏”，以“廣考鏡而備研求”，“其各省書局之書，皆存局代售”⁷⁸⁾。

(3) 批發。如廣雅書局的書，“惟政府(備正式公文)咨調，坊間批發，九折計算。”⁷⁹⁾

以上僅就發行途徑而言。此外如私人購買並相互轉贈、傳抄、借閱，所在多有，無疑使局本有了更廣泛的傳播。

3. 靈活多變的文獻流通策略

為振起文教，擴大影響，快速流通圖書、傳播文獻，以與書坊乃至其他書局相競爭，不少官書局採取了靈活多變的文獻流通策略，以滿足不同層次

76) 據朱士嘉，《官書局書目彙編》，中華圖書館協會，1933年鉛印本。

77) 沈家本等修，《(光緒)重修天津府志》卷二十四〈公廨〉“官書局”條，《續修四庫全書》本，冊690，頁503。

78) 康有為代張之洞撰〈上海強學分會序〉，下附〈強學會章程〉，載《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卷一，張靜廬輯注，上海：群聯出版社，1954年版，頁39。

79) 見朱士嘉，《官書局書目彙編·附錄》。

的需要。在保證品質的前提下，行款、裝訂、用紙、售價方面都力求有所變化。以下是江蘇書局幾種圖書的售書價目⁸⁰⁾，可窺一斑：

《司馬溫公書儀》 每部一本(字小一號)	
連史紙	每部足製錢壹佰玖拾肆文
毛太紙	每部足製錢壹佰貳拾肆文
《讀禮通考》 每部三拾貳本	
連史紙 裝 訂	每部足製錢 伍千肆佰玖拾文
不裝訂	肆千捌佰陸拾文
賽連紙 裝 訂	每部足製錢 伍千貳佰貳拾文
不裝訂	肆千伍佰玖拾文
《江蘇全省輿圖》 每部三本連夾板	
料半紙 著 色	每部足製錢 肆千文
連史紙 不著色	貳千文

可出看出，紙張差別、裝訂與否、著色與否，都是決定售價的因素。甚至開本不同，售價也會跟着改變。如江西官書局的《資治通鑒綱目三編》：

六裁官堆紙	一兩七錢三分
八裁官堆紙	一兩四錢三分
六裁吉連紙	一兩一錢三分
八裁吉連紙	九錢五分 ⁸¹⁾

如果同一種書為不同的書局刊刻，售價往往各異。尤其是四書五經，受科舉體制的影響，幾乎每個書局都有刊刻。直隸官書局運售各地官刻、私刻圖書，為各官書局之間及書局與書坊之間“同臺競技”提供了平臺。以下根據《直隸官書局運售各省官刻書籍總目》，略舉兩例：

80) 《江蘇書局各書價目》(內頁又名《江蘇書局重訂核實價目》)，江蘇書局編，光緒十九年(1893)刊本。

81) 見《直隸官書局運售各省官刻書籍總目》，直隸官書局清末(1905年後)刻本。

書名	書局或書坊	紙質	定價
《四書讀本》 (六本)	江南局	官堆紙	五錢
	江蘇局	連史紙	七錢四分
		官堆紙	五錢六分
		毛太紙	四錢六分
	湖北局	竹連紙	八錢
		官堆紙	七錢三分
	江西局	官堆紙	五錢五分
		吉連紙	四錢二分
李光明	官堆紙	六錢四分	
浙江局	官堆紙	四錢	
《易本義》 (二本)	湖北局	竹連紙	三錢二分
		官堆紙	二錢七分
	江西局	官堆紙	二錢一分
		吉連紙	一錢五分
	江南局	官堆紙	二錢四分
	江蘇局	官堆紙	一錢九分
	李光明	官堆紙	二錢四分

據該目前錄公文及凡例，各書定價是在原價基礎上，折合運輸成本在內，並加利一成，主事者自稱“得利甚微”。從上表可以看出，各局同等紙質書籍的售價，與當時著名刻書字鋪李光明莊所刻童蒙讀本大體持平，甚至更為低廉。

為擴大銷售，有的書局還出臺了一些優惠措施，進行打折或頒發優待證。如山東書局銷售章程所載：“凡持有長期優待證者，一律按定價八折。如購書書價超過二百元者，即無優待證，亦照八折。滿一千元者，折扣隨時商定。”⁸²⁾ 許多書局還將本局書目低價售出或免費隨書附寄，也有利於擴大影響。

82) 見朱士嘉，〈官書局書目彙編·附錄〉。

光緒八年(1882),總理海防支應總局在天津問津書院,集中展銷各省官書局書籍:“總理海防支應總局奉爵閣督憲札飭籌備成本,購運南省官書來直,原價發售,以惠士林。現擇部問津書院設局發賣,已將各省官書局書籍一律運齊安放,並於局內懸掛總書目、售書章程,又留存刊就總書目一本,所有價值照南省十足製錢,劃一不二,定於二月初九日開售。士子欲買購,到本局查閱書目,照章付錢,取書無悞。其各府州縣尚未有地方官運書發賣者,各士子亦可轉托親友赴津購買。光緒八年二月告示。”⁸³⁾通過這個告示可以知道,各書局均有售書目錄與章程,主辦者還彙有總目;各府州縣地方官運售局書,也成爲日常事務之一。這次展銷,實具後世書市的性質。

V. 晚清官書局在近代文獻傳承中的地位

近代中國處在急劇變革的時代,如何轉向、適應新的世界秩序,讓古老的國度煥發活力,是傳統中國需要面對的時代課題。欲完成自強維新、救亡圖存的歷史使命,不得不分塗爲二:一是學習西方,尋求制器之法、變革之道;二是取法古人,從傳統中尋找因革損益的文化資源。即使面對西方的器物制度,中國知識階層仍然從既有的知識體系出發,逐步認識、理解與接受⁸⁴⁾,作爲理論建構與道路抉擇的基礎。既有知識體系的文化基礎,就是傳統文獻,主要通過官書局的刊印活動而得以鞏固。在地方督撫及其幕僚的主持與推動下,晚清官書局刊印、傳播了大量傳統文獻,成爲近代文獻傳承的主要承擔者。通過士大夫的口耳相傳,通過局本的廣泛流布,通過與中央官刻、坊刻的對比,通過與翻譯、出版西學書籍的對比,我們不難得出這一結

83) 張燾,《津門雜記》卷中“官書局”條,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五十七輯,文海出版社,頁123~124。按:這次展銷,實際上就是前揭李鴻章飭命設局售書的後續行爲。

84) 王爾敏指出,“當西方知識器物傳入中國,朝野士大夫恒以其固有的知識基礎,從事于了解說明和批判討論”,“本着固有觀念抽繹其理論系統”。見氏著,《晚清政治思想史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頁2、5。

論。

官書局所刻書，以校勘精審，頗受朝中大臣親睞。曾國藩任直隸總督時曾致信馬新貽，要求寄贈金陵書局所刻前四史：“本年正月，寶佩衡索贈此書，弟許以不久寄贈。樞廷諸公，同聲索取，亦皆允許。恭邸笑曰：‘但須寄函穀帥，便無不了之願。’將來敬求閣下留意，裝訂五部，由洋船寄來敝處。”⁸⁵⁾ 寶佩衡指寶璫，恭邸指恭親王奕訢，均為滿洲親貴，中興名臣。此條史料，足能說明官書局所刻書在京師上層所受歡迎程度。

官書局所刻書，復以質美價廉，流播全國，亂後“經籍蕩然”的局面漸為改觀，傳統文教基本得到恢復。光緒十七年(1891)年，馬丕瑤上奏說：“發捻之亂，烽火遍諸行省，海內藏書燬失不少。蕩平以後，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皆孳孳以此為務，所至輒設局刊書。二十餘年，網羅散佚，漸復舊觀。”⁸⁶⁾ 光緒二十二年，李端棻在奏摺中，極讚官書局：“古今中外有用之書，官書局有刻本者，居十之七八。每局酌提部數，分送各省，其費至省，其事至順，一奉明詔，事即立辦。而餉遺學者，增益人才，其益蓋非淺鮮也。”⁸⁷⁾ 時人評浙江書局所刻書：“中興而後，各行省創設官書局，延攬通人，搜羅善本，士生其間，誠哉厚幸。浙江之有官書局，始於同治六年，迄今三十載，鏤板二百餘種，率古書之切要者。校字精而定價廉，讀者便之。光緒七年以來，復累減書價，嘉惠寒賤，意美法良矣。”⁸⁸⁾ 不過，由于追求價廉，難免出現部分刻書行數、字數較密的情況。

光緒十六年(1890)江蘇書局有一份抄本，記錄了江蘇官書坊兩個月的銷售記錄。該坊閏二月份“新收”湖北、揚州、浙江三家書局的圖書122種，三月份這個數字是134種，而當月“開除”的數字也相同。每月銷售以上百種計，可見其盛況⁸⁹⁾。

85) 曾國藩，〈復馬穀山制軍函〉，載《曾文正公書札續鈔》，見《曾文正公全集》第二十種，頁146。

86) 載《光緒朝東華錄·光緒十七年二月壬戌》，總頁2856。

87) 李端棻，〈奏請推廣學校設立譯局報館摺〉，載《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二編》卷一，頁6。

88) 許家惺，〈變通浙江官書局章程議〉，載《經世報》1897年第7期。

清代文化繁榮，出版發達，官刻、坊刻、家刻鼎足而三，共同承擔起刊刻傳統文獻、傳承文化遺產的重任。近代兵燹使東南數省文教傳統遭受重創，坊刻、家刻一蹶不振。此後雖有恢復，無論質量、數量，都很難與局刻抗衡。清代中央官刻原本極盛，尤以武英殿刻書聞名天下，但嘉道以降，刻書漸少，近代以來，人才、資金缺乏，管理不善，版片日損，同治八年(1869)又遭大火⁹⁰⁾，武英殿基本上無力刻書。光緒二十七年(1901)，禮部、政務處會奏變通科舉章程時還說：“閩中備考書籍，均係欽頒，間有調閱，隨時坊間購置。禮部向存書庫，卷帙紛繁，兵燹之間，全行散失。”⁹¹⁾對比而言，傳統文獻的刊刻、流布與傳承，基本上依賴各省官書局來完成。

由于官書局所刻之書分散各地，學界雖有不少個案統計，但其總量還無法精確得出⁹²⁾。1930年，朱士嘉將江南、淮南、江楚、江蘇、浙江、山東、湖北、廣雅等局書目輯成《官書局書目彙編》，共收錄2934種(其中由山東書局經銷的局本即有1290種)。由于該目只統計了八家書局的情況，也並非全貌。據此，即使是保守估計，官書局的刻書也至少在三千種以上。在災難深重、左支右絀的近代中國，有此成績，殊為不易。

近代中國為自強新政、救亡圖存，不得不向西方學習，因此，譯介、出版西學書籍，構成了近代文化史上另一大出版潮流。據統計，自1860至1900年，共出版西學書籍555種；1900至1911年，共出版西學書籍1599種，合計2154種⁹³⁾。這個時段，與官書局的出版活動時間大致相同，但西學書籍的出

89) 諸可寶輯，《光緒十六年閏二月分官書坊收售各書數目四柱清冊》，光緒十六年(1890)江蘇書局手抄本。

90) 參楊玉良，〈武英殿修書處及內府修書各館〉，載《故宮博物院院刊》1990年第1期，頁30。

91) 《會奏變通科舉章程》，載《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二編》卷一，頁65。

92) 據學者統計，金陵書局至少刊有76種(李志茗)，廣雅書局近300種(葉農)，崇文書局有300餘種(孔毅)，湖南書局118部、傳忠書局25部、思賢書局86部(胡昭熔)，浙江書局有251種(陳邦翔。以上各家論文見前注)。江蘇書局有206種，聚珍書局25種，南菁書局有209種，味經書局81種，江西書局172種，桂垣書局172種(以上六家據鄧文鋒《晚清官書局述稿》頁226~227)。以上十三家，合起來超過2000種。

版數量，遠不及官書局刊印傳統典籍的數量。兩相比較，晚清官書局刊印傳統文獻的活動，仍然是近代出版活動的主流。值得注意的是，晚清官書局對傳統文獻的刊印與傳播，主要集中在1900年以前，此後即漸趨式微；而西學書籍的翻譯與出版，則在1900年後呈加速態勢。升降轉易之機，在於戊戌變法失敗、八國聯軍侵華給國人帶來的強烈刺激，從此，民族革命取代變法、改良，民主、共和取代封建帝制，成為新的時代主題。時移勢易，官書局已失去進一步開展業務的條件與動力。

晚清官書局畢竟是地方官刻機構，具有傳統官僚機構不可避免的缺點，在人員安排、經費籌措、刊書內容等方面，過分依賴地方督撫等大員，主事者之眼光、好惡、學術水平、政治前途等，對刻書影響極大。在技術手段的應用上，不少官書局仍以傳統的雕版印刷為主，從而失去書價上的優勢。幾種因素疊加起來，遂使不少官書局在末期陷入尷尬的境地⁹⁴。光緒後期及宣統時期，清廷黯弱，政局日頹，官書局的刊書活動因此日趨式微。辛亥革命後，帝制瓦解，官書局賴以生存與維繫的體製不復存在，振興封建文教的使命於是終結。

綜上所論，在近代中國內外交困，救亡圖存成為時代主題的歷史背景下，晚清官書局因曾國藩等中興名臣的文化自覺與大力扶持而得以廣泛設立，為恢復、振興封建文教而刊刻了大量傳統典籍，且以質精價低的優勢，使圖書得以廣泛傳播與流通，從而為近代中國教育、自強及改良運動，奠定了傳統思想文化的文獻基礎，並因此成為近代文獻傳承的主要承擔者，足稱保存傳統文化典籍的功臣⁹⁵。官書局的出版事業，由此成為近代文獻傳承之

93)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修訂版)》，頁8~12。另一個統計結果是：“從1811年馬禮遜在中國出版第一本中文西書，到1911年清朝統治結束，首尾100年，中國至少翻譯、出版西學書籍2293種。”(頁12。)

94) 1907年，《雲南》第六號上刊載了一則題為“雲南官書局之可惡”的文字：“官書局之設，原以普利士林，非以漁利也。今吾滇官書局所售之書，價昂於坊間，士林罕向該局購取者，不知辦事者是何居心？”(頁12。)可為這種尷尬提供一個例證。

95) 朱士嘉已稱官書局是“傳布文化、普及教育的無名英雄”，見《官書局書目彙編·引言》。

“最良事業”⁹⁶)。

<參考文獻>

- 李鴻章,《李鴻章全集》,時代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 康有為,《康有為全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修訂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 中國史學會主編,《太平天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大達圖書供應社,1935年版。
- 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張靜廬等校點,中華書局,1954年版。
- 白君禮,〈搶救瑰寶 嘉惠後學——記丁丙對圖書文化事業的貢獻〉,載《圖書與情報》2003年第1期。
- 陳弼編,《同治中興京外奏議約編》,上海書店1984年影印清光緒刻本。
- 張文虎,《張文虎日記》,陳大康整理,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版。
- 嚴樹森編,《胡文忠公(林翼)年譜》,載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八輯,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
- 胡林翼,《讀史兵略》,《續修四庫全書》本(影印清咸豐十一年(1862)春武昌刻本)
- 梅英杰編,《清胡文忠公林翼年譜》,載王雲五《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第四輯,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
- 鄧文鋒,《晚清官書局述論稿》,中國書籍出版社,2011年版。
- 方宗誠,《柏堂師友言行記》,《續修四庫全書》本。

96) 劉聲木說：“(官書局)刻印四部中要籍，流傳甚廣。平時人視之，若不甚措意。日本那波利貞撰《燕吳載筆》□卷，中言中國各省設立官書局，歎為文化設施之最良事業，甚為欽美。”劉聲木《菴楚齋續筆》卷三，載《菴楚齋隨筆續筆三筆四筆五筆》，頁283~284。

- 陳其元,《庸閒齋筆記》卷三,中華書局,1989年版,頁59~60。
- 左宗棠,《左宗棠全集》,上海書店1986年據光緒刊本影印版。
- 劉聲木,《長楚齋隨筆續筆三筆四筆五筆》,中華書局,1998年版。
- 張靜廬輯,《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二編》,上海群聯出版社,1954年版。
- 柳詒徵,《柳詒徵史學論文續集》,柳曾符、柳定生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 李志茗,〈從倡節義到興文教〉,載《社會科學》2010年第10期。
- 徐蘇,〈江蘇官書局考辨〉,載《圖書館雜誌》1990年第5期。
- 羅正均,《清左文襄公宗棠年譜》,《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第二十輯,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
- 梅憲華,〈晚清的官書局〉,載《出版史料》1989年第3、4合期。
- 王曉霞,〈晚清官書局研究綜述〉,載《大慶師範學院學報》2011年第2期。
- 蘇曉君,〈從國圖館藏看金陵書局所刻書〉,載《中國典籍與文化》2010年第1期。
- 王媛整理,〈曾國藩、李鴻章、洪汝奎等致張文虎函札〉,載《文獻》2009年第2期。
- 徐棟原編,丁日昌選評,《牧令書輯要》,《續修四庫全書》本(影蘇州書局刻本)。
- 《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縮印浙江書局彙刻本,1986年版。
- 孔毅,〈清代官書局刻書述略〉,載《文獻》1992年第1期。
- 葉農,《廣雅書局始末及刻書考》,載《出版史料》1990年第2期。
- 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59年版。
- 王懿榮,《王文敏公遺集》,《續修四庫全書》本。
- 端方,《端忠敏公奏稿》,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十輯,文海出版社。
- 汪士鐸等纂,《(同治)續纂江寧府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本(江蘇府縣志輯第二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 謝廷慶等修,《(光緒)江都縣續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本(江蘇府縣志輯第

六十七種), 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江蘇書局編, 《江蘇書局各書價目》(又名《江蘇書局重訂核實價目》), 光緒十九年(1893)刊本。

朱士嘉, 《官書局書目彙編》, 中華圖書館協會, 1933年鉛印本。

沈家本等修, 《(光緒)重修天津府志》, 《續修四庫全書》本。

張靜廬輯注, 《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 群聯出版社, 1954年版。

《直隸官書局運售各省官刻書籍總目》, 直隸官書局清末(1905年後)刻本。

張燾, 《津門雜記》, 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五十七輯, 文海出版社。

王爾敏, 《晚清政治思想史論》,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7年版。

李端棻, 《奏請推廣學校設立譯局報館摺》, 載《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二編》卷一。

許家惺, 《變通浙江官書局章程議》, 載《經世報》1897年第7期。

諸可寶輯, 《光緒十六年閏二月分官書坊收售各書數目四柱清冊》, 光緒十六年(1890)江蘇書局手抄本。

楊玉良, 《武英殿修書處及內府修書各館》, 載《故宮博物院院刊》1990年第1期。

《雲南官書局之可惡》, 載《雲南》1907年第六號。

<국문초록>

근대 중국은 열강의 침략 아래 내외가 모두 곤경에 처했다. 실로 “수천년 이래 없었던 비상시국이었다.” 부국강병, 새로운 정치, 개량, 나라를 구하는 것이 시대의 주제였다. 함풍(咸豐), 동치(同治)시기에 전화(戰火)가 대대로 내려오던 전적과 인문학 체계를 무너뜨리는 상황에 직면해 증국번(曾國藩)을 위시한 중흥의 대신들이 자발적으로 관서국(官書局)을 설립하고, 막료들을 청해 경비를 조달해 경사자집(經史子集)과 어린이 도서를 간

행, 민심을 수습하고 인재를 육성하여 봉건 인문학 교육을 회복하고 부흥시켰다. 이러한 조치는 다른 총독과 순무(督撫)들의 호응과 조정의 허가를 얻었다. 아울러 동치(同治) 광서(光緒) 연간에는 이런 기풍이 널리 퍼져, 모두 판본을 구하고 교열을 세심히 하고, “합리적인 가격”을 원칙으로 하여 관방과 시장 두 통로를 갖추고 전국에 퍼뜨려, 근대 중국 교육, 자강과 개량운동에 전통사상문화의 문헌기초를 확립했다. 이로서 관서국은 근대문헌 전승의 주요 계승자이며, 전통 문화전적으로 보존하는 공신이 되었다.

주제어 : 만청(晩淸), 관서국(官書局), 근대문헌(近代文獻), 전승(傳承)